

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

TGP Shouldn't be Started Now

李 锐

(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、中国能源研究会,顾问)

1989年4月,国务院召开记者招待会,有记者问及三峡工程,姚依林副总理(当时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)答复时,曾正式宣布:“三峡工程主张上马的有道理,反对的也有道理。反正五年内上不去,现在不必花很大精力去争论,五年以后再考虑。”现在上马之声紧锣密鼓,报刊电台一齐宣导,人们都在议论,三峡工程大概就要上马了。

50年代,三峡工程上马在经济和技术两方面都是绝对不可行的,我曾力言反对。1958年初“大跃进”声中,中央南宁会议、成都会议讨论三峡问题,采纳了我的意见,此事从缓。60~70年代,在葛洲坝因仓促上马出事停工时(这个工程技术上成功,发电效益也大,但上马时既违反河流开发程序,又违反工程基建程序),1970、1971、1972年,周总理为此开过多次会,曾极严厉地批评了急躁蛮干、不实事求是、不总结经验教训和不敢坚持真理的思想作风;批评了好说大话、好办大事的人;说长江出了乱子,不是哪个人的事,是整个国家、整个党的问题;指明高坝大库(三峡)是我们子孙的事,21世纪的事。周总理多年管水利,管三峡,尤其有了三门峡的严重教训后,才讲得如此痛切。1979年我恢复工作后,在电力部三年,对长江泥沙淤积、生态环境、河道变化和中下游防洪措施等增加了新的认识,又曾多次建议推迟上马。1984年后的三峡工程论证,我没有被邀参加,但仍一直关心此事。现在虽然经济和技术上三峡的可行性比50年代大不相同,如电力是需要的,工程本身技术上是可能的,但并非经济技术和生态环境等都绝无问题了,特别是泥沙淤积等不少关键问题,还难下最后结论。世上有些事情允许冒一定风险,可是三峡这种不仅关系四川、长江而且关系整个国家长远安危之事却绝对不允许冒任何一点风险。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,我过去讲的够多了,现再次直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和建议,供有关

方面参考。

现在看到的论证报告的结论是:为了解决长江防洪、发电、航运问题,三峡为“无可替代”的方案,迟上不如早上,越快越好。尽管又经过几年时间和几百位专家的论证,我仍认为这是打如意算盘的“一家之言”,“一面之词”。事实上据我所知,所有各种反对方面的意见(缩小规模、推迟修建或根本反对修建),并未能在论证过程和历次论证报告中,得到充分反映;关于防洪、发电和航运的各种其他方案,即符合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具体情况的,先易后难、先支流后干流、先上游后下游,又很少移民,且投资分散和见效快的方案(总之,各种优于三峡的方案)在论证中得不到同等公正讨论和充分重视。我认为万里同志下面这段话正是值得注意的:“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,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‘理论根据’的工具。这种所谓‘科学’的决策论证,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,比没有论证更坏。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。它只受实践的检验,只对历史和人民负责,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。”(《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》)。

为此,我建议国务院和人大最后论证时,一定要让赞成和反对的双方,都能平等地、充分地各述其见。十三大报告曾说,“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,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”。三峡之事理应是政协、人大的重大议题,但最近报刊和电台却如此空前地宣导尽快上马,在舆论上大有一边倒之势,可是,优先开发上游支流、反对上马的意见却极难见诸报端。

二、

三峡工程有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,这里重要提出以下四个:

1. 投资太大,非目前国家财力所能负担

三峡工程总工期不会少于20年。论证过程中出现过的总投资从361亿元到570亿元,如果计及物价因素,达1511亿元,计及利息当更远不止此数。以三峡工程之巨,若似以往办法,开工后再追加数倍投资届时将骑虎难下。国际经验数据,河流大水坝工程投资,由于工期过长、物价上涨和资金利息等原因,最后结算一般为早期概算的4倍以上,葛洲坝未计利息近4倍,巴西依泰普为6倍(无移民、通航问题)。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应当说还有严峻的一面,企业亏损面大,金融财政形势不容乐观,“八五”投资尚未全部落实,社会害怕物价上涨等。如此顶风上滩,三峡大船恐难驾驶。过去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跟我谈过:三峡虽好,投资难办。

2. 移民太多

论证报告假定2008年建成时,需移113万人,有的专家指出此数考虑不周,最终将达160万人。此事我有经验,新安江移民30万人,至今还有问题,三门峡、丹江口等莫不如此。国外移民最多者十来万人。移民要做到不恋故土,谈何容易。所谓“开发性移民”,投资到底多少?办工厂能容纳多少人?种柑桔要多少地?说心里话,我从根本上怀疑此举——为了解除荆江北岸几百万人可能遭遇的1870年型洪水的威胁,让川东160万人永远离开故土,淹没十几个县市、七八百座工厂,这经济上合算吗?难道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吗?许多专家论证,办法是有的。例如1980年水利部向国务院上报的《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》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该报告以防御1954年型洪水(超过百年一遇)作标准,加高加固堤防和确定分蓄洪区,计划十年内完成。可惜由于志不在此,这个计划至今没有完成。要知道,全世界河流最高防洪标准为一二百年一遇,长江防洪标准以百年一遇为宜。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,还是发展中国家,防洪标准只能逐步提高。现在三峡移民区赞成迁移是由于多年来限制发展,希望中央快给钱,以便另起炉灶。如何照顾当前发展,又不碍将来可能搬迁,这种两全之法是可以找到的。

3. 泥沙淤积碍航问题没有解决

1984年已经通过的150米方案,即因水库回水变动段泥沙淤积上延将影响重庆成为“死港”终于放弃。经过这几年很多专家研究所得结论:高水位方案(170、180米),泥沙淤积已不同程度影响重庆市区、港区和嘉陵江口;175米方案运行10年后,干流将出现浅滩河段,重庆港淤积逐渐增加,

嘉陵江口将出现拦门沙等。这比150米方案情况更坏。论证报告中寄希望于将来优化水库调度,结合港口改造、整治疏浚等措施,以求解决泥沙淤积,这都是靠不住的。三门峡的教训来自泥沙,丹江口、龚咀、乌江渡许多水库都有泥沙严重淤积、库尾碍航(丹江口)等问题,这是最现实的“模型试验”。长江已是多泥沙河流,年输沙量在6亿吨左右(世界第4位)。不少国内外专家称泥沙淤积为三峡问题的“瓶颈”,加以其他生态环境变化等问题,根本反对修建三峡工程。据我所知,无论三峡或葛洲坝,在交通部门多年来也是有争论的,改善长江航道自有行之有效的别的省钱办法。此外,自古以来,三峡两岸多滑坡岩崩,明朝有过两次几十年断航历史;1985年6月,离坝址不远的新滩滑坡,激起江中涌浪高达36米。库区还存在诱发地震等构造条件,以及下游河道冲刷变化等问题。国内外生态环境专家对此提出各种警告,令人担忧。

4. 将严重增加重庆和四川洪灾

水库拦洪,由坝前向上游壅高水位,再加上泥沙淤积,洪水大泥沙也大,势必增加上游洪灾损失。1981年四川特大水灾,受灾人口2 000万,其中100万人无家可归,淹田1 756万亩,企业3 000多个,成昆、成渝、宝成三铁路多处被冲毁,重庆、合川街道房屋泥沙淤积。如建三峡水库,据计算,将向上游抬高水位3~6米,损失更会大得多!1870年四川特大洪水,重庆水位比1981年还高出4.8米。为了减轻荆江大堤所受威胁而建三峡水库拦洪,必然增加上游四川水灾,遇大洪水还可能顶托嘉陵江泄流,造成拦门坎,则川东将成泽国矣。由此可见,将荆江大堤防御1870年型洪水作为修建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是不能成立的。为解荆江之险,不惜造四川之灾,这不是明显的顾此失彼吗!长江的防洪、发电与航运,必须具备全流域上中下游和支流干流统一观点,统筹兼顾,权衡利弊,比较效益,避难就易,符合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力,以达到花钱少,见效快的目的,绝不能死抱三峡,不及其余。

三、

根据长江流域支流众多的特点,合理的开发战略应当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需要,先在支流陆续修建水电站,既能提供廉价电力,又能同中下游平原防洪方案相结合,以逐步提高长江的防洪能力,同时取得航运、灌溉等效益。近年四川、贵州进行了三江(金沙江、雅龚江、大渡河)、乌江的考察和规划。这些水电富矿的开发,不仅带动四川、贵州和西南的经济发展,且使长江防洪能力大为提高,属于整个长江流域综合开发规划的组成部分。

这类防洪、发电、航运方面都优于三峡的方案很多,现在只举长江水利委员会(简称长委)的方案为例。1990年所编《长江中下游防洪综合治理方案》中初步规划,在2020年前,上游可建成13座较大水库(在三江及岷江、嘉陵江、乌江),共计总库容460亿立方米,有效库容343亿立方米,可以控制三峡以上长江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的70%,包括川西、川北几个暴雨区,长江上游洪水大部分来自这些地区。这样既可解决四川的洪灾,又可大大减轻对荆江大堤的威胁。即就防洪而言,能上下游兼顾,才是一举两得,而非三峡方案“舍上保下”。此外,经过这些水库的蓄洪补枯,还可提高长江干流水深,改善川江航运。这些水库蓄水过程中同时拦沙,加上上游水土保持,可使长江泥沙逐步减少,洞庭湖的淤积也可减缓。这13个水库共可装机约2 500万千瓦,比三峡工程多40%;移民总数只及三峡工程的40%,分开在13个地区,自然好办得多;投资也分散在30年的时间中,同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力相适应。同三峡工程相比,只剩下上游30%的流域面积尚未控制,这是不难解决的。将来如必要再修建三峡工程时,就不必采取现在的高坝大库方案,现在所遇到的上述投资、移民、泥沙和四川防洪四大难题,都可迎刃而解了。

四、

现在三峡方案的防洪库容只有215亿立方米,仅为上游百年一遇洪水30天洪量1 392亿立方米的15%,其作用是有限的。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5%,即川江洪水,不能控制中下游众多支流洪水。根据长委资料,不论有无三峡水库,1954年型洪水,汉口最高水位都是29.73米。该年长江中下游因洪涝受灾田地4 755万亩。据防洪专家组论证,有三峡水库,只能少淹177~327万亩。这就说明,三峡水库对武汉和长江中下流防洪防涝,并无很大作用。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关于三峡的决定说得很清楚:“在防洪问题上,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。”

30年论证中,作为要求早上快上三峡工程最主要理由是,如再发生1870年洪水,“势必在荆江两岸造成干堤溃决,向北将淹没江汉平原,并威胁武汉安全,造成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伤亡的毁灭性灾害。”那么,1870年洪水实际情况究竟怎样?根据历史资料,由于南岸堤防低弱,洪水冲溃了松滋口,当年荆江大堤在监利以上所有堤段(包括威胁最大的盐卡坝段)都没有溃决。现在是90年代的新中国,不论堤防状况和防洪经验与手段,同100多年前相比,怎么能说更加危险呢?如前所述,

那又将置四川于何地?嘉陵江口被泥沙堵住又怎办?三峡论证领导小组诸同志以及历来催促三峡上马的同志,不知对此考虑过没有?

因此,当务之急——这是我从50年代起就不断呼吁的,也是近年许多参加论证和关心长江防洪的专家们不断呼吁的,就是要认真抓紧完成历年提出的长江中下游防洪方案,因为这是中外古今最有效、最易办、最省钱的办法。荆江大堤确存在堤身隐患、堤基渗漏和迎流冲顶等问题,一遇较大洪水,就易出险患、堤基渗漏和迎流冲顶等问题,易出险情。可是,从1974年起的第一期加固工程,1983年检查,没有完成计划。1984年又开始第二期加固工程,据最近报道,投资只完成56%。为了从江中吸泥加强堤背,曾从荷兰进口4条大挖泥船,1985年政协经济组去调查时,才发现只有两条在工作,而且进度很慢。荆江大堤如此重要,“关系几百万人生命安全”,加固工程却拖了17年还没有完成,此事实令人费解。据说,为三峡工程上马作准备,包括施工现场和几个城市租盖馆所,已经花去4亿多元。既然防洪如此重要,荆江大堤如此险情,按照计划投资不过一两亿元,为什么不赶快将堤防工程完成呢?

防洪方案中还有利用中下游湖泊洼地分蓄洪水的措施,这本是自古以来长江防洪最有效的办法之一。历代以来,仅有河患而无江患。唐宋以前长江中下游很少洪灾,明以后,尤其张居正堵塞干堤北岸最后一个分洪口郝穴之后(南北两岸原有9穴13口分洪),云梦泽消失了。清人魏源著《湖广水利论》和长歌《洞庭吟》,纵论江湖水利,由于围垦者日众,“八百里湖十去四,江面百里无十二”,力陈“沿湖圩田岁增岁”之失策,提出“以川还川湖还湖”的正确主张。可惜我们有愧先哲,水利上实行“蓄洪垦殖”的方针,再加“以粮为纲”,1949年前长江尚有通江湖泊洼地25 828平方公里,现在又已减少了一半(1977年的统计减少46%弱),洞庭湖减少40%,湖北减少更多。要知道,2万平方公里湖泊利用1米水深蓄洪,即得200亿立方米容积,等于三峡的防洪库容。1985年国务院批准《关于黄河、长江、淮河、永定河防御特大洪水方案报告》通知中指出,要严格制止盲目围垦湖泊洼地,应该退田还湖的,应加紧落实。退田还湖,改农为渔,行洪区将种植业作为副业,发展其他产业,不仅利于防洪,且可提高经济效益,何乐而不为呢?从事水利工作的同志,为什么不向这方面努力呢?

1991年太湖、淮河大水灾,于是不少同志呼吁“吸取太湖教训,早上三峡工程。”虽然出于“防患未然”的好心,但这究竟是不搭界的两码事。为什么去年江淮地区总雨量少于1954年,而受灾面积和损失反比未修多少水库的1954年大呢?关于

今年太湖和淮河水灾的教训,据许多水利专家的分析,欲导水性,必掘水障,主要是忽视河道整治,原有排洪河道多年存在阻水障碍,如河滩造田、盖房、办厂等等,泄洪能力远不如50年代;原计划新开排洪河道,又迟迟未按计划开通;再加围湖造田,圩高水高,调洪能力大减;分蓄洪区则缺乏避洪安全措施,一遇暴雨,堤内渍涝难以排出。此等问题,长江中下游同样存在。早已确定的平原防洪方案,一直没有抓紧完成;多年围垦堵口,壅高江湖水位;分蓄洪区人口不加控制,安全设施不落实或年久失修,大量涝灾更易于形成。对这些问题理应寻求良策,抓紧解决。可是几十年来舍近求远,必办易办之事反而放松,难求难办之事则全力以赴——无时不催快上三峡。41年来,在防御洪水上,我们似乎走了传说中鲧的道路——一只注意了堵,用水库装洪水,劲头越来越大,三峡可谓极至;而对禹的道路——疏导,则注意很不够。正如200年前革新家魏源之言:“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,而上游之洪涨日甚一日,夏涨安得不怒?堤垸安得不破?田亩安得不灾?”新中国的建设者还得接受魏源这三个大问号啊!

洪水是河流的天然属性,有一个自然出现的机率,人类必须尊重自然、适应自然,而不能改变自然,要想完全免除洪灾是不可能,也不现实的。任何防洪措施只能起一定的防护作用,国家政策在于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。中外古今的防洪实践,最为有效的是采取综合措施,即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的选择和最佳结合,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自然和社会条件,必须实事求是,因时、因情、因河、因地制宜。丝毫不能有主观片面性,否则事与愿违。美国洪水灾害频繁,平均每6年发生一次大洪水,洪灾损失年均20至30亿美元,预计2000年将增至35亿美元以上。密西西比河虽然洪灾最严重,洪灾损失占全国一半,但包括洪水主要来源的最大支流俄亥俄河,都没有建水库防洪。1921年大水灾后,经过60多年的治理,防洪主要靠堤防、分洪道、河道整治以及支流水库解决,达到一二百年一遇防洪标准。超过此标准,就靠非工程防洪措施解决,如洪泛区土地使用管理以法令行之,绝不能违反;通过《洪水保险法》、《洪灾防御法》、《灾害救济法》等,实行强制保险政策;加强洪水预报、警报和撤退措施等。西方各国和亚太地区国家,近年也都广泛推行各种非工程防洪措施。不论美、苏、欧洲、日本,都主要靠堤防防洪,堤防极为强固,汛期无需多少万人上堤防护。我国七大江河堤防还需大大加固,才能保证安全,这是防洪根本措施。不论堤防或水库防洪,都须根据国家经济、技术、自然和社会条件,而有一定防洪标准。遇到超过防洪标准的特大洪水,

则需要考虑非工程措施,尽可能减轻灾害损失。多年以来,我国有关方面的防洪指导思想,一般重防洪轻排涝,重蓄轻排,重工程措施轻非工程措施;工程措施中尤重水库,轻堤防、湖泊洼地分洪与河道整治;对非工程防洪措施则更是注意不够。1952年修建的“荆江分洪区”,原有人口17万,现已增至43万,超过自然增长,原有安全设施已不够用或年久失修,于是拟用三峡的防洪库容来取代这个分洪区。由此可见,依赖水库的防洪思想何等严重。希望能扭转此种倾向,切实做好洪泛区的规划和管理,采取立法手段,制定《洪水保险法》、《洪灾救济法》,加强洪水预报、警报,以及必要的撤退计划,等等。总之,广泛加强非工程防洪措施,同加固堤防等工程措施紧密配合,这样才最有利于真正减轻和防止洪灾。

五、

最后,谈一下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教训。三门峡原定方案为蓄水位350米(海拔),总库容360亿立方米,蓄洪拦沙,想一举解决黄河下游的防洪和泥沙淤积问题,发电、灌溉和航运都有巨大效益。当时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根据黄河泥沙特点,主张降低水库蓄水位,坝底留大泄水洞,以便排沙(关于黄河治理他有一系列独到见解和主张);还有一位刚出校门的青年技术员温善章,提出低水位、小水库、少淹没、滞洪排沙的意见。但由于绝大多数专家(包括苏联专家)和各部门领导都主张建高坝大库,最后确定了蓄水位360米的高坝方案,后因陕西对淹没太大有意见,改按350米方案建设。当年我也是最积极分子之一,根本听不进去反对意见。

1960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后,库尾泥沙淤积严重,迅速向上游延伸,威胁到西安的安全,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。1964年12月,周总理主持治黄会议,听取各方面意见,才确定工程改建方案,降低水库运行水位,120万千瓦的大水电站,改为25万千瓦的季节性径流电站。周总理在会上说了许多语重心长的话。说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。头脑热的时候,总容易看到一面,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,不能辩证地看问题。说治黄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,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,宁肯淹关中;他还极而言之说,如果水库淤满泥沙,遇上大水要淹没关中,那就要把三门峡大坝炸掉。他说,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认识的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内掌握得比较全面、比较成熟的东

(下转第40页)

峡风光消失。其实三峡工程只失掉了原“雄、奇、险、幽”中的“险”，其它风光都完好无损。另外，巍巍大坝、巨大船闸、万顷平湖都将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旅游观光胜迹。可以肯定地说，三峡工程将成为我国的旅游中心之一。

三峡工程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是很大的，一是将出现一个面积达1 084平方公里的巨大人工湖，这将给水产养殖带来得天独厚的条件；二是将淹没八个家鱼产卵场；三是由于水温水速发生变化，将影响鱼类的产卵繁殖期。对这个问题，一要采取有力措施，如开辟新的鱼类繁殖场等，对珍稀鱼类进行保护，使之继续繁衍；二是坚持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原则，那些适应能力弱的鱼类迟早是要衰亡的，而那些适应能力强的鱼类将不断增多，新的鱼种也可诞生或迁移来此。

五、发展的原则

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不断运动、发展的，人类通过不断地认识自然、改造自然，把昨天一个个梦想变成了今天的现实。

在大型水利工程决策上，我们应该持发展的观点、动态的观点。例如50年代，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问题没有得到重视，结果带来严重的后果，而70年代的葛洲坝工程却成功地解决了水库泥沙淤积问题，绝不能由前者的失败而推断出后者也不能成功。

如果说50年代三峡工程就动工兴建，那是脱离了当时的国情，30年后的情况与当时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。国家已确实需要三峡工程，国力也容许兴建三峡，各项技术、社会问题已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，还有了在长江上建坝的宝贵经验和人才。

以水轮机与高压输电为例，这是50年代研究三峡工程碰到的大难题。当时我国只能制造7.25万千瓦的水轮机组，世界上最大的不过二十万千瓦，按当时三峡工程装机2 500万千瓦规划，需安装国产水轮机300多台，显然是不合理和不可能的。但是现在世界上制造7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技术已成熟，我国也可制造32万千瓦水轮机组了。因此，目前三峡工程规划安装26台68万千瓦水轮机组。又如，对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，50年代我国有关部门就开始研究，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葛洲坝工程的实践，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已基本清楚，问题虽很复杂，但是可以认识和解决的。其它50年代的难题，现在也基本上都已弄清，并且都在我国已达到的技术水平之内，都是可以解决的。在这种条件下，三峡工程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，并早作决策。

(责任编辑 冷远猷)

(上接第36页)

西，能够做结论的先做，未被认识的或未掌握好的，经验不成熟的，可以等一等，可以推迟一些时间解决。推迟是为了更慎重，更多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，有利于今后的规划工作。据说，在会上周总理还特别提到温善章。因为在三门峡论证过程中，他曾受到批评，说要登报声明，他对了，我们错了，给他恢复名誉。三门峡的改建方案，就恰恰是被否定了的温善章、黄万里两位反对派的意见。改建工程非常艰巨，要在左岸新开挖两条泄洪排沙隧洞，重新打开被封死了的施工时的导流底孔和改建发电进水口等，有大量水下作业。从1964年到现在，还没有全部完工。

1949年以来，国家非常重视水利建设，投资总计约1 000多亿元，加上群众劳务和抢险时的人财、物力，更超过此数几倍。水利工作成绩很大，失误也多。如全国已建大小水库85 000多座，“大跃进”中修的，病险库多，效益很差。据统计，1973年垮掉500多座，1974年垮掉400多座，造成种种灾祸。1975年8月，河南板桥、石漫滩两大水库（以及两座中型、50多座小型水库）垮坝，造成中国也是世界空前垮坝灾难，受灾人口1 000万。这次灾情、职责和经验教训至今未见总结，只听说责任在天——雨太大了。水工设计常识是决不允许洪水漫过拦河大坝的（重大工程多按千年一遇设计或校核）。1972年11月，为葛洲坝出问题，国务院召开的三天会议上，周总理曾严厉指出：水利工作20年不愿总结经验，急躁情绪，20年都在犯，屡犯屡改，屡改屡犯。吃了大亏，走了许多弯路。1982年，财政部为水利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向国务院作报告，谈到河南故县水库地质和效益差等等情况。为此，1982年5月，由国家计委负责人主持，召开了华北水利工作会议。不知这次会议中总结的经验教训，是否在近年来收到实效。

现在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太多，经济形势也并不可乐观，决不能再列计划外的项目。我虽然没有机会参加论证，但几次论证中正反两方面的材料，我都阅读过，国外正反两方面的文章我也看过一些。关于三峡工程，我过去多次写过意见书，在一些刊物和单行书本上发表过文章，内容包括上面提出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和意见。但这些意见从未得到过明确答复。考虑再三，我还是将这些意见再次提出来，希望引起有关方面重视。我认为，三峡工程现在还不能上马，还是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。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